

中國政治思想史

呂振羽著



111
E03
154

111

中國政治思想史

上冊
呂振羽著

初 版 序

一

本書原係我所編中國政治思想史講義稿修改擴充而成的。在系統上和原來的講稿比較，雖沒有過多的改變，然已不僅有詳略的不同，而對於歷史上各派思想家所代表的階級立場，都有重新估定的，自不免有結構上的部分變更。

我原先並沒有打算把這部講稿整理出版，後由於許多朋友和同學的鼓勵，才提起我這種勇氣。本來，在沒有產生一部較系統而正確的中國社會通史前，無論中國政治史、軍事史、法制史、哲學史、文學史、藝術史、宗教史……各部門的研究，要那些對中國社會史（至少經濟史）沒有素養的學者去擔任，實無異“大海撈針”，難以摸索着條緒的。何況在時代悠久、文獻“浩如煙海”而又真偽並出的情況下，更將增加研究的困難，也是無可諱言的。我是研究過中國社會史的人，無論我的見解正確與否，總算曾找出了一個粗略系統。因之，在拙著中國社會史沒有完成前，提早整理中國政治思想史出版，供從事中國史各別部門研究者的參考，在批判地繼承民族文化遺產的課程下，給中國社會思想史的發展以初步的估計，以及從歷史上來給予時代以較系統的暗示，又是我的一種不可逃避的義務。

本書包括的時代，係從階級社會的殷代奴隸所有者時代開始，貫穿着封建制的全時期——初期封建制、專制主義的封建制時期，以至近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這一過渡的時期。我企圖對這長時期中社會思想的各流派，從其形成、發展、死亡的過程上，以及其相互對立鬥爭——作為各別階級的本質的對立和同一階級內部各階層的統一對立——的關係上，作系統的探究。不過關於近百年這一部分，我尊重出版者的意見，不包括在此次出版的這部分之內，擬另於短期內出版。這是我自己引為歉仄的，諒讀者必肯原諒。（補註：接近百年部分的稿子，已於一九三七年平津淪陷時被焚。）

我的編著體裁，根據我對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初步結論，首先把中國史全部過程劃分為各個階段，各個階段又劃分為其發展過程的各個時期；從各個社會階段和時期的階級階層的構成上以及其相互關係的變化上去論究政治思想的各流派，又把每個流派中各思想家的思想，作為其自己的一個體系去論究。所以我的原意，是在學習剩餘價值學說史的精神去編著的，結果自不免“東施效顰”。（補註：本書原和我所編中國經濟史講義是姊妹篇，所以對歷史各階段時期的社會經濟及階級構成、階級關係和其變化，在這裏沒有詳論。在沒有覺得中國經濟史講義整理出版前，暫請讀者去參考拙著中國社會史綱。）

關於中國社會思想史這一部門的研究，前此已有些斷代或全部的著作，但馬克思主義者對這方面研究的歷史還很短，有些研究者雖企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而由於運用上的錯誤，沒能作出正確結論；資產階級學者的著作，由於其立場和方法論的關係，都未能得出較正確的結論，像梁啟超等人的作品，在當時會有相當的進步意義，到今日却已成了落後的東西；那些由假馬克思主義觀點出發的托派漢奸作品，不獨由於其方法論的錯誤，而且由於其別有用意的卑

鄙阴谋,其作品便完全是反科学的有害的东西,不当作为学术研究来看的东西。所以到现在还没有一部能比较令人满意而符合时代需要的产品。然对于中国社会文化思想作一较正确的总估计,在工人阶级领导的民族现实的实践斗争上,在民族文化传统之批判的继承的要求上,又是一件不容缓的事情。这部拙著还不是以中国民族文化思想的全面考察为范围,而只是其中的一个部门。其是否能获得较多的同情,比较能符合时代的要求,那只好期待于事实的反响。

二

百年来,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中国思想界及其对民族文化思想的估计,适应于社会诸阶级阶层的存在及其相互关系,有着各种不同的立场和流派。

自五四运动起,成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一个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运动,便成了中国文化思想运动的主潮。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中国旧文化思想,自始就表现一种严肃的态度、正确的立场,自始就在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彻底科学方法去加以估计。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只反对过时的、死去的或行将死去的旧文化思想,而且要求批判地去继承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即那些有现实意义的、有生命力的、积极的进步的东西,而加以发扬。五四运动时,李大钊的今和青春等论文,就开始表现了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认识民族文化思想的倾向。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其机关杂志中所发表的一些历史论文,基本上便开始表现了对民族文化正确处理的方向。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极困难极险恶的环境下,也努力进行了对民族文化思想的探讨工作,虽只是个别的少数人在进行,成绩也并不太

大，然却理出一个初步系统，也可见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文化何等重视！中共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等天才著作，不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模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具体环境具体斗争中的发展，是可以应用于一切被压迫民族革命的指导原理、具有相同特点的世界其他国家人民革命的指导原理。而且是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的结晶，是民族文化优良传统之继承的表率。就文化革命方面说，他不仅正确地估计了民族文化，提出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优良传统、创造民族新文化的方针和任务，而且把它贯彻到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实际行动中，至今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已成为支配文化生活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的现实东西。由此可见，只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才真正重视民族文化，才能科学地认识民族文化、继承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因此，深入地展开对民族文化思想之史的研究，把研究的结果提供到实践上去，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必要的课题。*

三

中国民族哲学思想的传统，是相当丰富的。世人常是这样说：“日本民族没有其自己的哲学，中国人却是富有哲学思想的民族。”这当然是不正确的。然中国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封建制所经过的时期分外久长，而产生了较高的封建主义文化，所以在封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形势一再得到缓和的基础上，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哲学的儒学和道学，都获得一再反覆的发展与阐扬，佛学虽产生在印度，然而在中国始获得其系统的较高的发展。可是无论何种哲学思

* 这两段，在一九四三年修订时有所增删，如文中新民主主义论等等，都是修订时增加进去的。

想,虽然有由于其民族所处地理环境等关系所给予的特殊性,以及由于历史传袭等关系所给予的特殊性等基础上,会给予其民族的意识形态如哲学等以特殊的色彩;但在其根源上,作为精神产品的哲学等东西,其本质却不是民族的,而是阶级的。

过去儒家对历史上各种社会思想流派的分野,一贯地分别为所谓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杂家……等所谓九流百家,此外还有后来的佛家等等;这完全把社会思想存在之根据的阶级内容隐蔽了,结果自然不能说明其本质。从五四运动开始,资产阶级各派学者,应用不彻底的、虚伪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思想史,最初从事这种研究的,在中国为胡适、梁启超、李石岑等,在日本有渡边秀方等。但他们对社会思想流派的区分,完全承袭着儒家。从他们的成就来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当时曾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注意,然而根本没有触着各派哲学思想的本质;而且在“上册”出版后,便不能继续下去,无异宣告其实验主义方法论的彻底失败。梁启超在形式论理学方面的素养上,还似乎比胡适高明些;他对“先秦思想”研究的著作,在当时也起了相当的作用,但也同样没有触着“诸子”思想的本质。李石岑在实验主义的阶段,对中国哲学思想并没有研究出一个系统来;在其逝世前的数年间,便开始抛弃实验主义,企图用历史唯物主义去研究中国哲学史,这是一个值得钦佩的进步。渡边秀方的中国伦理学史等书,却不但把中国社会思想各流派的本来面目隐蔽着,而又把它庸俗化了。虽然,在半殖民地文化支配下的中国学术界,宗主国学者的意见,却容易获得人们重视,所以象渡边那样无价值的著作,也公然在中国流行。一九二七年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工作者和进步的学者,才试图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来从事这一课题的系统研究。然其中有些人在其主观上虽也想应用历史唯

物主义，客观上却没能完成科学研究的任务；在他们，第一、由于其对中国社会史概念的模糊，自始便没有从社会经济构成及其变动的基础上，以及社会阶级构成阶级关系和其力量对比变化的基础上，去论究各派思想发生的根源和其本质，第二、他们应用的方法，自始就表现经济主义的倾向。他如陶希圣、李季、叶青之流为着反对马克思主义，便伪冒历史唯物主义的招牌，来贩运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商品。所以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不只表现概念上的极端模糊，且自始只从政治原因上去解说其所谓“政治思想”，并没有半点“唯物辩证法”的气味，只是半实验主义化身的绝对唯心主义。而他正是企图以此来麻痹青年的。李季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基本上并不是什么学术研究，而是应用假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来破坏革命。由假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的王宜昌的一些历史论文，把中国民族文化曲说为毫无生命力的僵尸，谓没有外力的撞击就不能有丝毫的进步性。这也不是什么理论上的问题，而是他们在响应日本法西斯军阀的对华侵略。叶青的胡适批判等，是应用假马克思主义加假三民主义观点写成的，更不是什么学术研究，而是其向日本法西斯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特务机关的陈情书；假马克思主义，是他寻找主子的本钱，假三民主义观点是他乞取主子录用的荐书。所以他故意抹杀“五四”时期自由主义文化思想运动的进步性，故意曲解中国古代哲学，抬高保守的落后的封建思想，都不过是他迎合其特务机关主子的观点之一种方式。

我在本书的基本出发点是：

哲学思想，虽能作用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基本上却是被决定于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形态，并与之相适应，随着其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如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哲学的儒学、道学和佛学，在其各自的本质

上,虽通过全封建时代都是相同的,然而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长期过程,以及其在过程中之不断的部分的质变,也同样在起伏着、变化着。同时,由于其阶级内部各阶层间以至阶层内部矛盾的存在,所以同是封建地主的哲学,而有儒学、道学和佛学的分别,在儒学、道学、佛学各自的内部又有其流派的歧异;又由于各阶层相互关系的变化,有时表现儒、道、佛三者的相互对立,有时表现三者的统一,有时表现儒、道思想的统一与佛学思想的对立。这不过是一方面的例子,即足表现历史自身的生动性,不是机械般可以把握着的。

四

本书的出版,完全由我自己覆校过。但在时间的仓卒中,或仍不免有鲁鱼亥豕之讹。

当我写本书的时候,承许多学术界先进朋友给了我不少指示和帮助,尤其是吴检斋先生给我的帮助更多。又我的弟弟持平曾从自然科学方面说明光、音、电等的运动法则(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的法则——虽然持平并没有学过唯物辩证法),贡献我作为哲学原理的参考。又本书原稿大部分,承袁炎烈、李邦彦两先生为我抄写过,我应该向他们表示谢意。

一九三七,二,二八。著者自识

一九四三,三,二一。修订

修訂版序

本書的初版稿，是一九三六年在南京匆忙中整理完成的，一九三七年由上海黎明書局出版，發行了五千冊；一九三九年在重慶，曾改訂了一次，由桂林文化供應社接受出版，到現在還沒見發行。

現又就初版在文字上略加增減，並改正了我自己所發現的一些錯誤看法。但自己仍感覺太草率。我胆敢把它付印，意在貢獻給讀者作為研究中國哲學史乃至中國社會思想史的一種參考資料；同時，拋磚引玉，我也可藉以獲取讀者的指教，以便重行刪訂。

一九四三，三，二一。呂振羽自序

修訂版再版代序*

—

辯證唯物主義指明：世界是統一的、物質的整體，在自然界中、社會中存在着共同的辯證法規律；自然現象的聯系與相互制約，是自然發展的規律性；社會生活現象的聯系與相互制約也不是偶然性的，而是社會發展的規律性。體現社會發展的規律性的科學就是歷史唯物主義。

偉大導師斯大林教導說：“究竟什麼是決定社會面貌，決定社會制度性質，決定社會由這一制度發展為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呢？”“這樣的力量……便是人們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謀得方式，便是社會生活和發展所必需的食品、衣服、靴鞋、住房、燃料和生產工具等等物質資料生產方式。”（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三年中文版，第一五一頁）而生產方式則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統一的體現，生產力又是其中最積極最革命的因素，生產力的變更和發展，首先又是從生產工具的變更和發展上開始的。

* 這是我一九五一年四月在中共中央東北局政治理論教員講習班的講授提綱，由東北日報以論社會思想意識、我們偉大祖國的偉大文化遺產為題，曾續在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四日、十五日刊登過，又曾收集在史學研究論文集裏面，現略加刪削，以此文作為本書增訂版再版代序。又本書這次再版，承東北人民大學歷史系、語文系的韓元亨、張振聲、單聯麟諸先生為我全部校對了一遍，特向他們表示謝意。——著者，一九五五年五月。

社會意識形態是為生產方式、即社會經濟基礎所決定的。馬克思教導說：“物質生活底生產方式決定着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過程。並不是人們底意識決定人們底存在，恰巧相反，正是人們底社會存在決定人們底意識……隨着經濟基礎的變更，於是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中也就會或遲或速地發生變革。”（轉引自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三年中文版，第一六四——一六五頁）因此，在歷史上，什麼樣的生產方式，就有建築於其上面的什麼樣的上層建築：政治制度、法權、藝術、哲學、宗教、倫理等等。因此說：自然、物質世界是第一性的，思維、意識是第二性的；在社會現象上，社會物質生活是第一性的，它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是社會物質生活的客觀現實的反映、存在的反映。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同志在著名的哲學著作實踐論中，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論作了光輝的天才的發展。他教導說：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東西。人的認識，主要地依賴於物質的生產活動，逐漸地了解自然的現象、自然的性質、自然的規律性、人和自然的關係；而且經過生產活動，也在各種不同程度上逐漸地認識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關係。一切這些知識，離開生產活動是不能得到的。”

“人的社會實踐，不限於生產活動一種形式，還有多種其他的形式……其中，尤以各種形式的階級鬥爭，給予人的認識發展以深刻的影響。”

“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

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二版，第二八一、二八二、二九五頁）

從這裏，我們可以更深刻地體會到：由實踐而來的反映與認識的深刻性，“……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同上書，第二九五頁）的規律性，直接從事生產的人們對社會歷史的偉大創造作用，革命的階級對社會歷史的偉大創造作用，現代無產階級的先進作用和領導地位。那種輕視生產勞動、輕視革命階級的作用的思想，認為人類知識純由於天才者的發現、發明和“英雄造時勢”的唯心主義思想，是完全錯誤的、沒有根據的。歸根到底，歷史是勞動人民創造的、是勞動創造的，人類的一切知識也都是勞動創造的。

二

歷史唯物主義斷言：社會思想、意識依存於社會存在；而社會存在總是先行的，思想、意識的產生或變革常落後於社會存在。斯大林說道：“顯然，首先是外部條件發生變化，首先是物質發生變化，然後意識和其他精神現象才相應地發生變化，——觀念方面的發展落後於物質條件的發展。”（斯大林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五二頁）他並指出科學社會主義還沒有發生時，資本主義已經存在了，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階級鬥爭已經發生了；社會主義觀念還沒有產生時，生產過程已經有了社會的性質。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存在以前，不能產生馬克思主義，當社會進入資本主義階段，無產階級還只作為一個“自在階級”，經過無數自發的鬥爭後，才產生馬克

思主義。當資本主義進入其垂死的帝國主義階段以及實現了一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時期，馬克思主義才由列寧和斯大林發展成為帝國主義時期無產階級革命的學說、社會主義建設的學說。當中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過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戊戌運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直至五四運動以後，我們才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正如偉大導師列寧在其經典著作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所論述，俄國怎樣經過半世紀的辛苦閱歷，“才掙得了馬克思主義這個唯一正確的革命理論”，和“在這個異常堅固的理論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布爾什維主義”（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六九三——六九四頁）。我國從鴉片戰爭算起，整整經歷了八十年的辛苦閱歷，才掙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唯一正確的革命理論，才在這個異常堅固的理論基礎上產生出毛澤東思想，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當社會變革以後，舊社會的思想意識，總還是多多少少或久或暫的殘留着。這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的蘇聯、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的目前的我國，都可以看見這種情況。因此，在無產階級革命或由其領導的革命獲得勝利後，對人民羣衆以至無產者本身的思想教育和改造，便成了最重要的任務。列寧曾說過：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將要重新教育千百萬農民和小業主，幾十萬職員、官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來重新教育無產者自己……是一個最重要的任務。斯大林在關於俄共（布）十三次代表大會的總結中也早就說過：“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底黨的最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展開在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精神下教育新的一代和重新教育舊的一代的工作。舊社會遺傳下來的舊的積習和習慣、傳統和成見是社會主義的最危險的敵人。它們，這些積習和傳統，束縛着千百萬勞動羣衆……”（斯大林全集，俄文本，第六卷，第二

(四八頁)在人民民主專政的我國，毛澤東同志也不只一次地像列寧斯大林一樣的講過。因此，也就可以理解：我們黨和毛澤東同志為何把思想教育問題提得那樣高。

社會意識的產生和變革常落後於社會存在，却並不與馬克思主義的預見相矛盾。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及其他天才領袖，根據那些已經存在或至少已在形成過程中的物質條件，掌握客觀世界運動的規律，提出當前所能夠解決的任務，指明鬥爭方向和歷史前途。實踐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預見完全是科學的，是合乎客觀規律的。

但是，不能因為歸根到底社會意識為社會生活的經濟的、物質的條件所決定，就認為是被直接決定的，就否定觀念發展的相對獨立性及觀念的繼承性在社會意識發展中的意義，就否認其自己的發展規律。恩格斯說過：社會意識的每種形態，不論哲學、藝術、法權、道德等等，在每個時代都有一定的思想上的材料作為其先決條件，這種思想上的材料為其前一代所傳給的，而社會意識的每種形態則從這些材料出發。舉哲學為例：“在經濟上落後的國家，常能夠在哲學上起領導的作用；例如十八世紀法國對於英國（法國人就是立足在它的哲學上的），後來德國對於前兩者……”（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思想方法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四七頁）從另一方面說，今日帝國主義諸國家中，美國經濟超過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而美國的哲學、藝術、道德等等，却反而更加庸俗、頹廢、腐敗、反動和落後。所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只承認人類偉大文化遺產的偉大作用，而且善於從那些先進思想的偉大觀念中，吸收有價值的東西。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又必須承認上層建築對社會經濟的積極作用，才能正確地理解：政治運動的反作用及其所具有的相對獨立性；才能正確地

理解：人類對歷史的能動的創造作用，革命階級和偉大人物偉大思想對社會前進的推進作用，反動階級和反動人物反動思想對社會前進的阻撓作用，這也就是上層建築對社會發展所起的加速或阻礙作用。否則，就不能正確理解像法西斯思想及其他反動思想的異乎尋常的巨大罪惡，像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英機、杜魯門、麥克阿瑟、艾森豪威爾、杜勒斯、蔣介石之流的異乎尋常的巨大罪惡以及帝國主義、國民黨一類反動集團的異乎尋常的巨大罪惡；反而會歸咎於社會規律，要歷史來替他們擔負罪責。因此就勢必輕視對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鬥爭，輕視對一切反動思想的鬥爭。同樣也就不能正確理解歷史上某些對社會前進及人民生活起過積極作用의思想和措施的進步性；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全人類空前無比的光輝作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這些無比偉大的人物對整個人類社會的推進作用；中國革命為什麼在機會主義領導下遭受損失和失敗，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英明領導下就獲得今日這樣光輝的勝利，使我們祖國成為全世界最重要的政治的軍事的強國之一。因此，就勢必抹殺歷史，就勢必減低對領導的信賴，輕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對錯誤思想的批評、對羣衆的教育。由此就可以理解黨的正確領導的重要性、無產階級革命學說的重要性，學習這種學說並以之去教育羣衆的重要性；由此就可以理解在和真正的羣衆運動、真正的革命實踐密切聯系中形成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和中國革命運動、中國革命實踐密切聯系中形成的毛澤東思想之所以堅強有力，之所以給予我們以無限信心，之所以把我們引向勝利，它在每個時期都給予我們以確定的方向和獲得勝利的方針……對我們的勝利有着何等巨大的作用。但這並不是說，歷史不是勞動人民所創造，不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在我們的一部分知識分子中，自覺或不自覺的流行着一種觀點，

這便是粗魯地、簡單地認為歷史上凡是與統治階級有關的東西，都是不對的，毫無可取的；像孔孟那樣的大思想家、李白那樣的大詩人、紅樓夢那樣偉大的文學作品、雲崗石佛那樣偉大的藝術作品、張騫朱元璋那樣的人物、霍去病薛仁貴那樣的名將等等，都是毫無價值的。這在實質上就是一種否認和截斷歷史的經濟主義觀點。另外也有一些人，只了解英美文化的一些皮毛，對偉大祖國的偉大文化遺產，本來無知或所知不多；反而讚美外國資本主義文化，輕視偉大祖國文化的優良傳統。這却是半殖民地文化以至買辦思想的殘餘。另一方面，那種無條件無批判地誇大本國歷史的國粹主義觀點，在我們人民學府的個別角落也還存在着。這同樣是不對的。

歷史唯物主義又肯定：“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二版，第二八二頁）。因為人有兩種本質：一種是人的自然本質，即人的體質、聰明、健康及本能等（比如在醫學上就有各種體質的人）；另一種是人的社會本質，即人的心理、思想、意識、觀點、習慣及其要求等。“一切的人們是作為階級的人而存在的。如是，人的社會本質，就由人的階級地位來決定。由於人們的階級地位各有不同，人們的社會本質也各有不同。”（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九〇頁）各階級人們的社會本質，無不有其一定的特性：譬如封建統治階級的封建割據性、互相兼併性以及奢侈性、殘暴性、身分等級性、權位思想、宗派觀念等等；資產階級的損人利己性、競爭性、壟斷性、奢侈性、冷酷性、投機性、盲目性、組織上的集中性和機械性以及個人事業性等等；農民的散漫性、保守性、狹隘性、對財產的私有觀念、反抗剝削者和壓迫者的反抗性革命性、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進步性組織性，以及對土地和政